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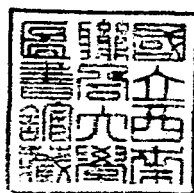
來歸火烽

高語罕著

1109

來 歸 火 烽

著 罕 語 高



1939

目 次

一	未動身以前.....	一
二	過廣州.....	九
三	粵漢道中.....	一九
四	武漢小住.....	二九
五	買輪東下.....	四九
六	到南京.....	六一
七	于右任先生家的一餐飯.....	七一
八	陵園訪問馬相伯先生.....	七七
九	抗戰與農民問題.....	八七

中日戰事史料彙輯會

一〇	到安亭前綫.....	九九
一一	到上海前綫.....	一〇九
一二	南橋之夜.....	一一九

一 未動身以前

蒼茫倚劍獨哀吟，

偶瀉天靈自吐吞。

眼底戰場應有我，

那堪憔悴作詩人！

這是我『二二八』以後在上海寫的。此後救亡運動已經瀰漫全國，我並沒有加入救國會，但並不是說我們袖着手站在救亡運動的圈子以外。在研究方面，我會幫着程演生，李季子和王獨清先生做整理『中國內亂外禍歷史』的工作，所整理的此項叢書，已陸續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

中國圖書公司出版

版，這時，我的筆名是『王靈皋』。在行動方面，則是以個人資格做推進救亡運動，其中可述者有兩事：（一）是九八老人馬相伯在民國廿四年冬季與民國廿五年上半年所發表的一日一談（前一部分在天津益世報發表，後一部分在廣西民國日報發表），都是我紀述的。（二）東北義勇軍某軍的參謀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到上海來時，我會替他找馬相伯先生，朱子橋將軍，陶行知先生等幫忙。後由陶行知先生間接介紹我這位學生到南京來見馮煥章，李協和兩先生，要求他們幫助，馮先生是見着了，但他們這幾位先生除陶馬兩氏外，均抱持重和冷淡的態度，不得要領，這或許是地位的關係吧。但是埋頭十年的我，忽然又在社會上露面，便引起上海黨政當局的注意，有一次在上海愛文義路，幾乎陷入偵探的網羅。可巧，這時香港報界有位朋友約我擔任撰述，于是我就跑到

香港。這是民國廿五年冬天的事。

在未動身之前，我的夫人會極力阻止我，要我不要去。她說：『此去無好結果。因為我們的生活來源，完全操在一個人手裏，必定要完全聽他指揮，不然便要被他挾持，結果，又要發生恐慌……』我不相信，一定要去。臨走的時候，我的夫人送我上船，風雪撲面，兩人都極力地壓制着緊張的情緒，含笑而別，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

患難相依十二年，暫時話別倍淒然。

叮嚀猶自說『珍重』，江海茫茫雪滿天！

快到香港時，我又寫了一首詩寄吾妻道：

我獨南行數千里，此心猶在浦灘頭。

時因北風一回首，離情孤憤兩悠悠！

到了香港，會見那位報界中的朋友。他那時招待我很殷勤，當他談到撰文時，我便很誠懇地向他提出下述的條件：

(一) 不替人做歌功頌德的文字；

(二) 不做我所不願意做的文字，不說我所不願說的話；

(三) 我所做的文字，在文字上可以修改，內容不能改動。

這位報界朋友除了第二條附帶條件外，前兩條都無條件的答應了。但是經過一兩月後，時局的變動，影響了我的文字生涯，我所寫的文章既被人弄得驢唇不對馬嘴，有時簡直弄得不通。而且選擇題目，布置內容，完全要聽命於主人，於是我的文字工作完全便變成一種奴隸生活，機械般地活動着，而我却不能用我的靈魂說話，這是多麼可恥，多麼痛苦的事！所以我每次要替他做社論時，便像上法場似的，精神完全恍

惚了。良心的譴責太難受了，於是我就向這位朋友坦白地做了如次的談話：

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但我的革命的源泉還沒有完全枯竭，少年時代的一段波浪的歷史的回憶還沒有完全忘却！我的許多老朋友大半都爲革命而犧牲了，有一些現在還關在牢監裏。慚愧得很！十年以來，偷生海隅，實在對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們！只有一點政治的人格與良心，還沒有出賣。現在要教我出賣我的良心與人格，那就無異於戕害我的生命。請你原諒！我此後不能給你再做社論。……

對方說道：

不妨！不妨！我們再想別的文字工作。……

但我已經知道萬不能再繼續下去，毅然把這種文字工作擺脫了。可巧這時蘆溝橋的事變發生了，我的久已澄靜的心情，又非常的被激動了。這時我的夫人已到香港來，遂和她商量，決計歸國。到了上海戰事起來，我就打了一個電報給舊友張文伯（治中）總司令，文曰：

南京探投京滬警備司令張文伯將軍鑒：抗戰既起，舉國興奮。弟十年伏處，偷生海隅，際茲時會，已不願再事苟活，決計回國馳赴軍前，竟一死所，不識政治環境，其許我乎？束裝待命。弟語罕。

好久沒有回電來。後來有位朋友說：張總司令已往上海，南京的電報恐怕收不到。於是我又打一個電報到上海，由黃任之先生轉，電文本來和前電一樣：被我那位朋友改掉了，等了好幾天又沒有回電（我走後

復電才到），我的心情很急躁，熱血沸騰到如此地步：

地暗天昏浩劫初，偷生已是十年餘。

請纓無路惟孤憤，報國有心敢索居？

漫卷詩書束高閣，忍將血淚付蠹魚！

此身只合沙場死，化作精禽滿太虛。

我們終於決定了馬上就走，不等待張將軍的回電了，但是我們兩手空空，從那裏找盤川呢？不得已，向前導書局的老板商量，將我的老友汪孟鄒先生所經理的亞東圖書館賣給前導的書錢，借了兩百塊，邀着我們的青年朋友潘朗君（港報的特派從軍記者），同伴踏上了我們回國請纓的征途了！臨走時，我們每人只帶了隨身換洗的單夾衣服，一切行囊書籍，都丟在香港。我別香港時的心情是這樣的：

別了！別了！

再見！再見！

實則我憎惡你到了極點！

我不願再和你相見！

你不但有那醜惡的外觀，

你並且包容着一切的黑暗！

假使再和你相見，

除非把你洗心滌面！

二 過 廣 州

·潘明（號公昭）君因為要到廣州省政府和行營去辦他的旅行記者的護照，早走一日。臨行時，我們約好：他在廣州先把粵漢鐵路的票買好，我們第二天動身，到廣州後，在粵漢鐵路車站聚齊。動身的那一天，我們都在一位朋友陳君家裏吃午飯。原來陳君也是某報一位職員，人很熱心，他的社長自動地允我要他陪我們到廣州，照應一切，不曉得為什麼臨行時變卦了，說是有事不能遠送。陳君對我說時，格格不能吐，我知道他有困難，極力安慰他。同時有位新交的朋友沈炳文先生，願意伴我到廣州，我力辭。因為他到廣州和我們一樣地陌生，他送了我們以後，

又要同我一樣孤伶伶地一個人回到香港。我們只得在九龍車站和他們珍重握別！乘廣九車，我這一次是第一朝。火車嗚嗚地開行以後，不久便到深圳，看見了我們的武裝軍警，Eitel歡呼道：

『呵！這是我們中國地方了！你看！那中國的軍警！』

我極力壓住我的感情，默默地，對那些青年戰士放射我的沉重的眼光！我的內心在忐忑地跳動了。大約有三個鐘頭吧，到了廣州。這時天色已晚，我們出了廣州車站，在那罩了黑紗的半明半暗的電燈下面，遠遠地望見了潘先生和另一位青年朋友舒沛泉先生在那兒翹着腳，睜着眼睛四處張望，我們打了招呼，他們便歡欣鼓舞地跑了過來，接着我們手中的行李。原來舒先生是昨天陪着潘先生到廣州來的。舒先生是廣州本地人，情形熟悉，我們見了他，一切都放心了。但是一片戰時的景象，

如：各馬路的燈光都息滅了，兩旁的店舖都老早關門閉戶，街上的行人無幾，車馬之聲很稀等等，又把我的心情緊張起來了。我們大家帶着行李，坐了兩輛汽車，開到粵漢車站，站裏面的人和行李真是如山似海，爲了幾件稍微大點的行李箱籠買行李票，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把我們的舒先生累了滿頭滿臉的汗珠兒望下掉，結果，還是花了三五塊錢的小費，才算過了磅，買了行李票，搭上粵漢車。舒先生，那位可愛的青年！我們握別時，他對我說了許多請益的話，並且說，我知道得太晚了！我很感動！火車開動了多遠，我還遠遠地望着他，直到他的身子在烟幕與夜色下消逝爲止。

這時又有另一思潮，湧上我的心頭：

廣州！廣州！我們別得太匆匆！

我和你有過三次接觸：

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年的當口！

那時我爲了全國教育，

曾在此間作了半月的勾留，

我曾敬謁黃花崗，

追懷我那慷慨赴死的故友！（宋玉琳烈士）

十年國事蜩蟬裏，

萬里山河破碎中。

低首獻花腸九折，

已無餘淚哭英雄！

第二次是在我歐洲歸來以後，

我參加了革命二次代表大會，

三個月的軍人生活，在黃埔！

三月十八的政治把我送走，

我很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你，廣州！

自然我也是走得氣沖沖，

仍然是很驕傲地衝向前面的兩叉路口，

又悲壯的歌道：

卸却戎裝又儒裝，

平生書劍幾行藏。

踉蹌浮海非高隱，

祠罷中山祠馬昂！

舟泊黃埔又歌道：

離騷讀罷聽悲笳，

入夜江聲走萬蛇。

曾住此間三月暮，

而今一水似天涯！

自此以後，廣州！廣州！

你我中間橫了一個深淵！

這條深淵真是悽慘！

拋疏了我們千千萬萬

人的鮮紅的血，——青年志士的鮮血！

天陰月黑鬼嘍嘍！

好似千山路隔！

但是魔鬼的吞噬，

終敵不過洪爐般的鮮血的熱烈，

牠終於凝結成鐵，

撐起一道橋樑，

把我們大夥兒緊緊地在一處相結！

今天是第三次了，廣州！廣州！

我們不能不感謝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牠把我們國內的衝突一時泯滅！

我今兒又能看見了你，

使我心中無上地喜悅，

雖然在這黑魘魘的夜間，

看不出你的真正的芳顏，

是不是變了一些？

還是依然和十數年前的一樣的廬山真面？……

二等臥車中擁擠而嘈雜的人聲忽然打斷了我的思想，回過頭來，幫助我的夫人，姪女，潘先生找鋪位，打開行李，籐箱，找出毛巾揩汗以後，來同潘先生攀談，才知道我們的車票費了多少手脚才買到。車中

的人大半是從廣州到內地去逃難的，有一些學生裝束的青年乘客，據說是從日本和歐美歸國的，因為上海不能登岸，所以取道香港由粵漢路回國。大家對於我這白頭老少年都以奇異的眼光相看。這時我還不理會。

我拿了一床線毯就捲在下層的一個舖位上躺了下去，但是我不過車中的生活已經十年了，現在又重嘗這種滋味，而且是爲抗日的熱情所驅使，神經非常興奮，不大睡得着。加之天氣還熱，悶在底下，更是難過，一連起來幾次，和我的夫人談話，被她埋怨了一頓，說是：『自己不睡覺，不要妨害同車的各位客人睡覺！』我沒法，勉強躺下去，恍恍惚惚地，一覺睡到天亮！我的床舖對面的兩個客人不願開窗，我的姪女要他開，他們不肯，裏面的空氣非常壞，但是沒法，我只好把頭常常伸出車窗外，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三 粵漢道中

第二天一覺醒來之後，到了站頭，我們便爭先下車，散步，透空氣。在晨光之下，首先映入我的眼簾的，就是車站上貼着沒精打彩的一兩條抗戰的標語，車上許多軍官兵士，上上下下，雜着許多中產以下的乘客在車站木柵邊，向着柵外的男女老少賣吃食的，買東西吃。此外還有三三兩兩背着手看閑的。除了上述的標語，黃藍色軍衣的官兵和站上的電燈罩着黑紗表示行軍和防空的事外，其他一切都和尋常一樣，人民的面孔上對我們浮着一種奇異而冷淡的表情，絲毫看不出大戰時代後方的緊張模樣，我那滿腔熱情鼓勵我四處去尋找抗戰的表現和新聞，終

於白費氣力。只看站長一吹氣笛，我們馬上跨上火車，車便開了。車頭吐出黑烏烏的煤烟，發出一種沉悶而憂鬱的聲音，衝破了太陽邊的雲翳，現出東方的曉色來。我們洗過臉，吃好早點後，大家坐着無聊，Enlee 便唱着『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和『慰勞歌』。她唱着，我們也用忽高忽低不三不四的喉嚨喊出各種怪聲和着，因此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對面二層舖上一位四川的留日學生，是初從日本回來的，先同我們開談了。他告訴我們他們在日本的一切痛苦，又告訴我們大使館怎樣不負責任，使我心裏很難過：因為我和現在駐日大使許靜仁先生為同鄉，且有一日之雅。這位青年的無邪氣的訴苦，一方使我感到中國留日的許多青年在那兒無人照顧維護，任人踐踏之可憐；一方面又替我們的許老先生的老境發愁，他現在的處境簡直是活受罪。政府以這種不必

要（大使早應該撤回）而又只有等着受辱的責任加在他老先生肩上，我實在不敢恭維。同時這位留學生又告訴我們，他們的同學這次取道粵漢路回鄉很有幾位。我問他回到那裏去。他說：先回四川。過了一回，潘先生又告訴我，說是香港九龍的救災服務團有二十多人，也乘這班車，這個團體實則就是到前方服務的組織。團員都是青年，十分之八是九龍的店員和學生，有一小部分是在廣西臨時加入的，據說，有幾位正是辭了職務，賣了薄產來幹的。他們的動機大都可說是純潔的。此外，潘先生又告訴我，還有一些從歐洲留學回來的。他們也都很關心中國抗戰的問題。九龍服務團中有兩個女團員，曉得我的姪女會唱歌，她們就來邀她去參加他們臨時組織的歌詠團，我的夫人很持重，因為不曉得她們的底細，不大願意讓她去，我則極力慫恿。她們結着去了，我也跟着去，

到了這些團員所在的那張車子上，才曉得他們開團務會議剛歸完。她們唱歌，我這老腔也跟着瞎唱。唱過之後，他們竟要我演講。我本來好說話，他們既然找到我，我就不願推辭，就開開我十多年未曾開過的話匣子。說了起來，自然是太興奮了。我告訴他們，我們此次全家歸國的意旨，及對於這次抗戰的政治意見。說到後來，我簡直哽咽住了。我的夫人恐怕我太吃力，太興奮，要潘先生把我拉了回來。這是我們和九龍服務團同車的一段因緣。第二天，車中上述的幾個團體開了一個聯誼大會，潘先生同我的夫人都不主張我去參加，恐怕我要說話，太吃力，但是等到他們來喊我時，我又去了。這一次的談話，大家都發表了意見，都很莊重鎮靜，我也極力壓住我的情感，沒有多話說，也沒像昨天那樣興奮。

其中有一位德國留學生，說話很能引起人的注意。看他的裝束和談吐，可以斷定是個軍人。他說，『德國的希特勒式的政權，也不過徒有其表而已。蔣委員長始終是有抗敵決心的。有些人怪青年不應當懷疑政府，說是政府不抵抗；實則政府當局不能和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一樣，隨便亂說，事前得有相當準備。然而也不能怪學生。因為他們都是熱血青年，因國土淪喪，感情奮發，激而為種種快意的舉動。現在抗戰既經開始，蔣委員長的苦心，從此可以大白於天下了……』

又有某一個人說：在堅決的抗敵的條件下，沒有一個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不願意竭力擁護蔣先生的，若果在言論行動上反對堅決抗日的政府，那便要走到漢奸的道路上去。我們現在只有兩個營壘：一個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營壘；一個是站在中國民衆或政府中間，替日本帝國

主義做漢奸走狗的營壘……

談話會完了之後，三位女學生又站起來高歌：

『我們的隊伍是廣大強壯，

全世界被壓迫兄弟的鬥爭

是朝着一個方向！』

大家也不期然而然的站了起來，齊聲和着，在悲壯莊嚴的歌聲中結束了這個談話會。大家都好像異常親熱，都好像周遭的空氣中有一種什麼氣氛使得我們的精神感粘合在一起。我們在車中整整住了三天三夜，沒事總是和那幾位留日學生及那些九龍服務團員往來談天。他們看我頭髮白了，都稱呼爲『老先生』，其實我並沒有老。我的白頭只是我的物質生活不夠因而影響到生理的表現，至於我的政治意志和隨着時代的需

要而前進的心情，還是和青年時代的一樣地在活躍着。他們喊我『老先
生』，我只報之以微笑而已。

第三天下午車過汀泗橋時，特別使我留戀，使我感觸：

北伐時的獨立團，

一團打敗五六團，

在此地留下了一個難磨滅的紀念！

青青橋畔柳，

潺潺橋下水，

問當年壯士何處？

而今剩得幾人還？

剩得幾人還？

重理舊征袍，

抖擻精神，再幹！再幹！

爲民族自由解放而作戰！

因爲這一戰爭是決定北伐軍和北洋軍閥——吳佩孚的軍隊的戰爭。在這一光榮的勝利中，我們的許多好朋友受傷的受傷，犧牲的犧牲了。同時，我又想到一九二七年秋間，夏斗寅反對武漢政府，葉挺軍禦之於『線坊』（距武昌六十里）。一戰之後，夏軍潰退。我那時以中央委員隨軍參戰，隨着大軍赴咸寧，曾經到汀泗橋憑吊過當年的戰蹟。而今風景不殊，人事世情却已幾度滄桑，我於十年後重過此地，真有白頭宮女夢想開元天寶軼事之概。

天快黑了，車子到了徐家棚，才知道車站被敵人的飛機炸毀了。我

們帶着隨身的行李箱籠，從亂石崎嶇中步到過江的輪渡，「叮」幾乎跌了一交！檢查員對於我們特別客氣，他看我們的伴侶多半是學生，慨然地說道：

『走吧！學生是不會做壞事的！』

四 武漢小住

行李交給接家的，我們很輕鬆地上了過江小輪，在三等艙船尾找到了座位。九龍服務團更上一層，同武漢青年救國團相遇，大家又唱起救國的歌曲。沒有二十分鐘，在慷慨激昂發揚蹈厲的歌聲中，我們到了漢口。下了旅館，便打聽下水船，回答是：沒有一定時日，也許明天就有，也許要有三五天好等。我便決定在漢口住一兩天，看看十年不見的武漢三鎮，一面會會朋友。第二天早上寫了一封信給高涵廬先生，我的夫人親自送去，約他見面。高涵廬先生即高一涵，原名夢弼，號效良，安徽六安人。我們於民國元年在安徽教育廳同事。後來我到日本讀書，

他不久也到日本。一九二五年我自歐洲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課，我們在上海會過面。一九二六年我們又在上海見面。後來，我在武漢奔走，涵廬先生也到武漢中山大學任教授，因此和鄧擇生相識。當鄧擇生出走以前，涵廬先生曾任過總政治部第一科長。政變以後，人家總把我們兩個纏在一起，把高一涵認做高語罕，或把高語罕認做高一涵。實則我們是同省，同學，同姓不同名。但我們却是多年的老友。這次路過武漢，涵廬先生開府武昌，我萬不能過門而不入室，不去拜訪；二來是恐怕到南京時碰不到熟朋友，經濟馬上要發生恐慌，不得不向涵廬兄討幾個盤川。我的夫人打武昌回來，說是沒有會見涵廬先生，信已託他的號房轉交了。我想他的事忙，當天是不會過江來的了，我們幾個人又重新過武昌去，上黃鶴樓，遊蛇山公園。倦時，下山到漢陽門一家四川館子吃了

一頓午飯，又匆匆過江返漢口。登黃鶴樓詩道：

十載重登黃鶴樓，那堪回首訴離愁？

江流石轉千年恨，物換星移幾度秋。

北國開門縱狼虎，南朝抗戰起吳頭。

人人自有興亡感，忍說予先天下憂！

回到旅館，再問接客的：什麼時候有船。他的回答表現得很負責任，很友誼，說是：明天說不定有一條船下水。我們完全信賴了他，大家商議到廣東館子去吃飯，隨便到馬路上逛逛。買了一點必需的物品，如電筒，防毒藥水，紗布，棉花等物。回到旅館，有人說，漢口今晚映『抗戰特輯』的影片，Lily和Eliel都要去看。我對於電影本無大興趣，但是因為映的是抗戰實情，也很願意去看一看。七時，我們進了影

戲院，電影開演了，果然不錯。第一，牠把中國百年來被帝國主義宰割的歷史，如實地在地圖上有聲有色地表現出來，可當得一部中國外交史，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第二，牠表現中國抗戰之軍事上的物質準備與軍事教育努力；第三，牠揭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種種罪惡，如在漢口日租界所包藏的製毒機關等等；第四，表現出中國士兵之抗戰的英勇。不過我覺得還有缺點：第一，沒有表現人民參加的熱烈情緒（這不是攝片者的過處，而是政治環境，沒有造成這種事實）；二來是開映之初，夾雜一些外國歌曲，有點不倫不類；第三，開映的日子和地方太少，不能普遍；第四，收費較昂，一般必需看的平民沒有機會看得着，失却了動員羣衆和抗戰教育的根本意義。但是我對於這等影片着實喜歡，希望多多地有機會看得着牠，更希望軍事委員會深深地注意『普及』這一問

題。牠比什麼大學，什麼口頭和文字的宣傳都有效力，而且來得快！

出了戲院，我感着十分興奮，十分滿意，提議去吃『宵夜』，大家贊成，遂跑進一家設備奇異的點心館子，吃了點心，飲了咖啡，慢慢地踱了回去。這時馬路上已經是沒有多少人行走了，十字路口的警察在那燈光下，帶着審問的眼光注視着我們這些陌生的客人！當天一夜，我睡得非常好。第二天早晨，我們便盼望涵廬先生來談，不敢出門一步，等到中午不來，才出去吃午飯。吃過午飯又匆匆回寓，把接送旅客的茶房喊來問船，他仍含糊其辭地答道：明天或許有。我們不放心，自己跑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旅行社始而不負責任替我們買票，我們要把票錢先交給他，一俟有船，請他儘先代我們買，他才教我們把姓名地址留下。我們回寓不多一時，中國旅行社便打發人來說，下水船本晚有得開，我

們高興極了，遂托來人把我們的艙位定了，準備當晚上船。這時，我們的涵廬先生打電話來了。他說，晚上來看我。我說，晚上就要上船。他說，我三點鐘過江來。我說歡迎。果然，剛三點鐘，涵廬先生來了。我們兩個是年齡差不多的人，相對慨然！我的頭髮花白了，他的頭髮雖未大白，然精神着實委頓得很。我們談起話來，他的對於時局的認識，雖然還不減當年，但是於他那暗淡的眼睛當中，曉得他已飽經世故，十年的宦海生涯，把他的一點精彩都湮沒了！我不知怎樣安慰他才好！他的身體雖然發了胖，但是氣色却現出一種晦澀的表情，一切言論都比十年前更持重了，聲息更低了，我心裏着實難過，更不知怎樣安慰他才好。

他問我：到南京去怎樣打算。我說：一點打算沒有，此次只是爲了單純的抗戰熱情所驅使，一切自身的利害都沒有思慮過。他問我：到南

京預備先找什麼人。我說：我打算先找于右任先生，因為我在上海大學教過書，我們總是熟人，自然，既回國，不能不先到南京，既到南京就不能不向南京最高當局說明來意。我已預備好了一篇上蔣先生的信稿，若果會不見于右任先生或其他朋友，對蔣先生轉致一切，便把此信逕寄蔣先生。他說，那你先見于先生好了，陸一也在南京，我打一個電報給于先生好了。

涵廬先生談了一個鐘頭走了，臨走時，從荷包裏慢慢地掏出了一搭子鈔票，給我，輕輕地說道：『我也很清苦，這五十塊錢，權當杯水之助吧！』『于將有遠行，辭曰餽饌，于何爲不受？』我只得很感謝地受下了！涵廬先生去後，另外又有一個朋友來看我。他也在武漢軍政界做事，從他的嘴裏，我得了許多史料，現在我把牠拉雜地寫在下面：

他首先憤恨地說道：『假使沒有漢奸，我們在武漢這次至少可以俘虜日人十二條兵船和萬人以上的輕重兵器。』我道：『是怎麼一回事？』他說：『當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漢口的日租界與華界已形成中日兩國武裝對立的形勢。日本人在日租界裏至少有幾千人有武裝的，此外他們還藏有大量的軍火。但是日租界的周圍，我們已調了一兩師人把他團圍地圍起來了，兩方都是磨拳擦掌，準備廝殺。而且我們已準備封鎖長江，一旦封鎖，這幾千日本的武裝兵和十二條兵船，豈不成了「囊中之鼯」嗎？誰知忘八羔子漢奸漏了消息，日本的陸戰隊，兵船和僑民一齊逃了！我們已經到手的一筆財氣，臨時又被牠逃脫，你想氣人不氣！』

我說：『日本人爲什麼就這樣善善地退了去？除了上述的封鎖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他說：『啊！有的！有的！原來日本人之旅居武漢的，對於中日戰爭問題的意見可分三派：陸軍派（所謂陸戰隊）主張冒險地幹一下；海軍並不根本反對，但要奉政府的命令，不然，不願輕舉妄動，白白犧牲；至於日本的僑民商人（除了浪人外）則一致反對打仗，因為他們曉得戰端一開，絕非短期期可了，他們到了戰時退出以後，所有在漢口多年的經營財產都要化為烏有。他們一方面對於駐漢的日本陸軍提出反對開戰的意見，一面他們又曉得軍人派不會採納他們的意見的，於是直接打電報給東京外務省，詳陳不可開釁的各種理由，要求政府不要讓陸海軍人不顧人民的意思和利害，一意孤行。外務省站在外交的立場，電令駐漢的日本陸海軍和僑民一律退出，於是這一場惡戰便「幸而免」了。但是我總覺得太便宜了他們的一班兇漢們！唉！漢奸真可殺！可殺！』

我說：『武漢三鎮的漢奸這樣的多麼？』

他說：『破壞我們上述的封鎖長江，解決駐漢的日本陸海軍的計劃的，不是武漢的漢奸而是躲在首都行政中樞的漢奸，據說，是黃濬——黃秋岳！他們父子兄妹一家都是漢奸！』

我說：『那麼，武漢三鎮的漢奸不成問題吧！』

他哼了一聲道：『不成問題？自然！若果政府大着膽子讓民衆有了健全的組織，負起責任來，漢奸自然不成問題。但是你還沒看見，前方儘管打仗，後方却是「冷鼓清竈」，一點也表現不出民衆參加的景象來，但是漢奸却活躍得厲害！就拿一事做比吧！我們在前幾年建築了幾個砲台，日本竟把漢奸放進了工頭和工人裏來了，當砲台建築招工投標時，某幾個工頭所認的價目特別便宜，而他的工人做工又特別勤謹，後

來才發現了這些工頭及他所領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漢奸，因此我們這次所修的砲台的內部建築，都重新改造過，並且以後我們所修的砲台，又都用特別的方法招工，不敢再經上述那些工頭的手了，也不敢再招以前的那些工人了！你想，可怕不可怕！』

我又說道：『這種事情，如果是確實的，那真糟糕！但是，此外還有什麼「漢奸的故事」呢？』

他說：『多着呢！譬如，襄河一帶，就有千把！他們都有新式的武裝。有一次，他們有二百多人在襄河堤上暴動起來，那裏的警察沒有辦法，電請省政府派了兩營兵去才把他們解決。帝國主義的鬼計真毒！他在襄河沿岸養這些漢奸，目的在於破壞我們的襄河堤。假使襄河堤被他破壞了，則不但武漢三鎮成爲魚鼈，就是襄河附近及武漢下游各州縣

都得成爲澤國！」

『那麼，』我說：『黨政軍警當局應該十分注意啦！』

『這個自然，』他說：『黨政軍警自然天天在注意，你不看他們的文告嗎？然而事又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南京行政院出了一個「黃秋岳」，我們也有我們的「黃秋岳」！而且我們的「黃秋岳」不在行政衙門，而在軍事機關。武漢行營據說有一個機要科的科員前天被槍斃了，就是爲此。因爲武漢的軍事上的消息，往往一發動，甚至朝議決而晚上即被敵人曉得，經過一番詳密的注意，才看出這個機要科科員有嫌疑，但是還沒有確實的物證，後來經機要科科長很機警地用特別方法把他偵探出來，果真是一個漢奸，於是就馬上把他斃了！你看！這不是我們的「黃秋岳」麼？』

我說：『漢奸真多！』

他嘆氣道：『還不止此！你以為漢奸只是數量上驚人麼？不！他們的組織才真是嚴密！前一年的光景，我們一些朋友結伴去遊蕪，大家信步閒逛，逛到蕪邊一個洲上，洲上自然是遊客足跡所到之地，但不甚衝要，更非了不得的名勝，却矗立着一家很堂皇的大照相館。我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此地開設這麼大的照相館？有什麼生意呢？怎樣夠開支呢？但是這種懷疑也不過一剎那之間被我們的遊興打斷了！到了今年中日戰端既開，才又重新注意到這個久經忘却的照相館！你以為這個照相館果真是照相的麼？』

我說：『難道也是漢奸的機關麼？』

他說：『可不是！這個照相館是帝國主義在湘鄂各省一個製造漢奸

和指揮漢奸的機關。日本的特務長和中國的漢奸頭兒，天天夜間在這裏開會商議應付中國的種種計謀和發號施令；一面他們又在這裏開班訓練漢奸。據說沿粵漢路一帶爲這個機關所指揮的漢奸也不下千人，他們的頭目每天照他們所分派的地段按時查崗，看他們是否真正站在他們被指定的地位，和是否盡他們漢奸的責任。簡直比我們中國的警察憲兵還要嚴格！你看可怕不可怕！……』

我反問他一句：『漢奸是這麼多，但是他的根源究在那裏？我們的責任就在這裏！要追求他，不要放鬆！』

他透了一口氣，喝了一口茶，輕輕地道：『自然，不但要知道漢奸的實際狀況，並且要知道他的來源！我以爲第一個要因就是「生活」逼人。假使你要長住此地，看見武漢三鎮的工人生活及其他失業狀況，又

稍稍留心附近州縣的農村破產與夫農民顛連無告的情形，你便馬上可以明白現在的漢奸是為什麼這樣多了！現在黨政當局不是天天在提倡禮義廉恥嗎？但是管子說得好：「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究竟一般小百姓不能餓着肚皮等着他的靈魂跑到聖廟裏去吃冷豬頭！這並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是中西歷史所昭示我們的事實！」

『但是，』我說：『做漢奸的不都是窮人，譬如你所說的漢奸呢？』他毫不遲疑地答道：『自然也是生活問題，問題的討論不能從事態

的表面出發。生活有兩個極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第二階段則是超過這種必需的生活，即超過一般的生活程度的奢侈生活，不合理的生活。人們要是過着這種生活，或是希望過着這種生活，那就必然要用不合理的手段去達到這種目的。譬如黃秋岳吧！

他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薦任官吏，每月至少有五六百元的俸金，而他的兒子又任外交部機要秘書，也是好幾百元薪水，父子兩個合起來，每月有一千多塊錢的進款，就常理說，他們的生活是不成問題了，實則他的開支還是不夠，因為他有幾房太太，有的住在南京，有的住在上海，自然是公館好幾處，他每星期要到上海一次，去分點愛情給住在那裏的松鼠兒或是小鳥兒，而且他的應酬非常之大，他的公館裏常常是賓客滿堂，這末一來，正規的薪俸自然是不夠了，於是就不得不四處張羅。帝國主義者的駐京使者便乘隙而入了，他經過漢奸元勳鄭孝胥之介紹（有人說他之得入行政院是梅蘭芳薦給某秘書長的），得認識須磨（日本駐京總領事，後來曾代理過日本駐華大使），受了他的津貼，始而不過要他供給中國政府一些普通情報，後來（即將要發生蘆溝橋事件的時候），

日本的侵略者曉得他們生活的鎖鍊已經把黃氏細住了，遂翻了面孔對黃說道：「我們每月對你花了兩三千塊錢，而所得的情報都是些不重要的，此後可不行了！必須有特別的有價值的消息，不然，此項津貼就要停止。若果你能供給重要消息，不但不停止津貼，並且按照消息之重要性的程度加等酬勞。果真你不答應，我們就要把你給我們透漏中國政府的消息的事實報告給你們的政府，那時，你便要馬上問罪！」這時黃氏若果不答應，事情鬧出來，真是「吃不清兜着走」，而且眼睜睜地富厚優裕的生活馬上就要失掉，一方面又望着更加優裕的境遇，於是把心一橫，眼睛一閉，傾死心塌地做漢奸。千古做賊的，大半是這樣地演成的！這能說不是生活問題害了他嗎？」

我方在沉吟時，他又接着說道：「平心而論，若果沒有十年的內

亂，也不會產生出這麼多的漢奸！」

『這話怎講呢？』我說。

『十年來的內戰，』他說：『即劉共（討赤），誰是誰非，現在我們都不必談了。因為「國共合作」已成事實，從前的舊帳只有把牠一齊葬送在慘痛的回憶中了。但是痛定思痛，追求今日的高等漢奸如此之多的原故，不能不說是這種內戰的必然的結果。因為政府既決定實行劉共，討赤絕俄，自不能不和其他列強（尤其是日本）表示友誼或退讓。古人說得好，「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又說，「上有好者，下必尤甚」，這末一來，當局雖無心教他們做漢奸，而無形中便散播了培養漢奸的種子，一些望風承旨，喪心病狂的官吏便不知不覺地走上漢奸的道路！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對付漢奸雖然必需嚴刑峻罰，但是若果

要從根本上剷除漢奸，那就須：

(1)使民衆的生活一般的改善；

(2)使民衆對於政治獲得自由發揮其性能的機會，因此使他們對於國家具有一種歡欣鼓舞的熱情。』

我狠狠地打了一個寒戰！茶房催促上船的呼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們只得握手說：『再會吧！』

五 買輪東下

我們和潘先生於八月廿九日晚上上了輪船，船上的人很多，我們的二等艙已經擠得滿滿地了。因為我們是老早在中國旅行社買好了艙位，所以到了船上，一點也不發生問題。我和潘先生一個房間；Lily和Evelyn一個房間。船上的乘客，也和火車上的乘客一樣情形，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軍人。當天晚上收拾收拾，大家都預備睡覺了。不過天氣太熱，房艙（即二等艙）內悶得很，我一夜沒好睡，總是出來走走。有時踱到艙外，伏在欄上，望那黑漆一團的夜色，心裏忽然起了一種戒心：前途究竟怎樣？轉而一想，只怕敵機空襲，沒有月色正於我們有利。而且兩岸的地

平綫上似乎已露出了微明，忽然想起

『不貪夜識金銀氣』（杜工部句）

一句詩來，這時我頗感到自己的驕傲的表情。輕脆的浪花的声音，伴着我如潮的情緒不斷地向前進，涼風吹着我的薄薄的短衫，已經感到秋氣的涼爽，再站下去，便有點清冷的樣子了。於是回轉身去，進到房內，埋頭一覺睡到天亮。

我們在船上最惹人注意：第一件是我一個白頭少年帶了家眷在戰爭的狀態中，從香港趕着望回跑，而一般紳士或中產之家的老老少少却趕着望香港逃，這是真令人懷疑的。第二，我是越老越不老成，總是逢人傾談，遇事便管，說到中日問題，我便起勁。第三，我的姪女喜歡唱抗敵歌曲，我們一行都附和她，大家聽了似乎有點異樣。第四，我的夫人

開口衛生，開口消毒，也使一般人聽了刺耳。但是因此我們也就在船上結交了幾個很好的朋友。這些客人却都是從九江上船的。第一位是一個航空人員，高高的個子，不胖不瘦的面孔，我一眼看見了他之後，不知什麼緣故，就深切地注意他的行動。他帶着懷疑的眼光瞟着我們，笑密密地帶着審問的口氣問道：

『你老先生貴姓？』

『姓王，』我答道。

『你老先生這大年紀，從什麼地方來？』

『香港。』

『香港？』

『是的！』

「那位女太太是你老先生的什麼人？」

「我的內人。」

「那位青年女士呢？」

「姪女！一道兒從香港來的。」

「奇了！人家都望香港跑，你老先生却……却帶着家眷向內地來？」

「是的！問題就在此，我們和他們不同的也就在此！現在我們不是在抗戰嗎？」

「是的！」

「不是說『動員全國的民衆力量』嗎？」

「是的！」

這位未通姓名的航空人員更狐疑地把兩眼直射到我的頭上，意思好像在發問：『你這大年紀，你能對於抗戰有什麼力量可盡？』我坦白的說道：

『我老不老，有力量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事實是這樣：我回來了，我不願意苟活在香港，去做忘了國的寓公。而且我們也沒有資格做寓公！我的內人可以担任一部分的技術工作，我的姪女（指內姪女）可以唱歌，我可以替些戰士們做點文字上的工作。人家投筆從戎，我却是戴筆從戎！』旁邊有一個大塊頭，大概有五十多歲了，忽然插一句，臉上帶着十分鄙俗的表情：

『其奈請纓無路啊！』

我看看他，衣扣上掛了一個藍瓷的徽章，不曉得什麼地方的！聽他

的口音是『江北人』，並床而臥的一個大塊頭的婦人，使眼色要他不要多話。我打量了他一回，只簡單的答道：

『唉！這叫做「士各有志！」』

轉過臉來繼續同那位航空員攀談。問他在航空署做什麼事情。他說：『提起來一言難盡！我們在美國學習航空，歸國的同學有好多位，但他們皆覺得航空事業辛苦，一方面國家素來沒有整個的遠大計劃，青年學生學成歸國，致令他們用的所學非所用。固然，我們青年人志向不堅定，同時國家亦不能不負責任。我之所以不願改行者，實在是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的責任重大，不願擇肥而噬，見異思遷。不然，我僅有升官發財的機會。』

我說：『你看我們的航空發展前途究竟怎樣呢？』

他說：「這也難說！從某些方面看，自然是進步；但從積極方面着想，現在的精神力量實在不夠。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潛伏的力量不夠發展中國航空之偉大的前途；而是說，司其事者皆未能遠謀，他們皆把事業當官做，只要敷衍了事便得；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令人啼笑皆非！俗話說得好：「官船漏，官馬瘦。」不然，我們的計劃果真實行的話，到了今日，我們自製的飛機已經在敵人的陣頭上和敵國的領空內大顯威力了！……」

『那末，』我說：『依你的意見，中國的航空豈不是希望很少嗎？為什麼我們的飛機員在這次戰爭中顯出這麼偉大英勇的身手來呢？』

『誠然，誠然，』他毫不遲疑地答道：『這不能不感激我們的最高當局的幾年的努力。但是，假使我們的計劃實行，那我們的空軍所顯出

的威力與其永久支持力更要多少倍呢！」

我們說話時，我很表示對於我們的空軍實力的憂慮，但我又不便問人家這種軍事秘密。旁邊另一位青年航空人員，也是從江西來的，插口道：「這到不必憂慮。」輕輕地對我耳邊道：

「我們的飛機至少有○千○百架。」

我聽了他的話，一面很安慰，一面又很發愁——為什麼他這樣輕於信任我這陌生的客人，說出這樣的數目字來？於是我不敢再往下談了，把話插開道：

「你們江西的防空設備怎樣呢？」

他倆知道我很持重，便也用謹慎的口吻答道：

「還好！還好！」

那曉得旁邊有一位光葫蘆頭的青年軍人，帶着四川的口音，很幽默地道：

『他媽的！□□□辦的什麼防空？一點也沒有！真是糟糕。』

我不得已使個眼色給他，要他不要大聲胡說，又把話插到別處道：

『你老兄是那裏畢業？』

『黃埔第×期。』他說。

『你老先生在那兒做事？』他反問道。

我却只好含糊地答道：『我是賣文章吃飯的。』因為我不願在路上讓人家曉得我的底細。但是我和那兩位航空人員的談話雖則就此結束，而他們和剛才一位四川軍人却又搭上了話頭，大談特談起來。這位四川軍人很自誇地大聲道：

『我們的空軍是有絕對把握的，即以飛機而論，我們將委員長至少已經預備了一萬多架……』

那位首先同我談話的航空員反駁他道：

『沒有那些！沒有那些！我在航空署機械科做事，還不曉得？至多不過……』

我馬上毫不客氣地制止他們道：

『你們兩位只可大概地談論，萬萬不可說出數目字來！萬萬不可說出數目字來！』

他們的談話被我忽然截斷了，那曉得話剛落音，船在江中拋了錨了。大家跑去問問帳房，才曉得有了『空襲警報』。大家都在互相警戒：不准吃紙烟，不准穿白衫的人站在艙外，電燈自然是一律熄了。但

是有人發現船上的買辦帳房在官廳客廳裏高高地燒着幾支洋燭，圍着一個擺滿了錯鑲的圓桌，在那兒很愜意地喝酒縱談，Tim和另一位從廬山來的女士（奉命赴前方醫院服務的醫生）夥着一家衝向官廳客廳去質問他們，他們不睬；這時激動了旁邊一個人，不問三七廿一，一伸手把他們的燭台拿過來，『鳴』『鳴』幾口氣把通紅的臘燭都吹滅了。一個通亮的官廳登時變成了一個黑暗世界！買辦們似乎不敢不領受這次的教訓，大家都默默地退了出來，各歸原位。

到了半夜，警報解除了之後，船又繼續開行。第二天到了安慶，下午六點多鐘到蕪湖，我們打算上去找一找以前的舊友，但是戒嚴的時期不敢亂動。半夜開船，早上八時在我們極端渴望中的南京送入我們的眼簾了！我這時的情緒是怎樣沸騰啊！

六 到南京

下了船後，先在下關招商旅館住下。招商在二十多年前曾經是南京一個上中等的旅館，現在變得不成樣子了，外貌都剝蝕得像一個老年人的死灰色的臉龐似的，裏面的傢私更是陳舊得不堪，樓板也壞了，人一走路便動盪不定，回想起我二十多年前所常住的招商旅館，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吃了飯，馬上坐汽車去找謝雲皋（安徽六安人），進了挹江門，即從前的儀鳳門，一路上，粗粗地看了一眼，南京的外貌大大地改觀了。馬路開闢得很寬，兩旁都有樹木，最莊嚴的是中正路和中山路，當中是

柏油路，——汽車道；兩旁是馬車，人力車路，中間隔以長方坪，圍以冬青樹與柏楊樹。再外面兩旁皆爲人行道，都很宏敞。此外新的立體式的建築和『皇宮式』外裝的政府機關的建築互相輝映着，顯得有多少的不調和，不勻稱，或許這就是東西文化之溝通罷！我忽然想起我所記的九八老人馬相伯先生的『一日一談』上的一首金陵感懷的詩來：

多少樓台建上京，鶴歸難認舊層城。

衰楊殘月秦淮水，流出青秋鳴咽聲！

這時南京的景象的確如此，但我還沒有聽見秦淮的水聲：是鳴咽？抑是怒吼！正幻想間，已到了莫干山路三號，雲皋的寓所。牠是一座西式的三層樓房，主人即兩湖『監察使』高一涵先生。這裏是新住宅區，離各國使館很近，所以房屋構造都很整齊美觀，完全歐化，而愜息其間的，

也大半都是政府的高級官吏。一半爲的是觀瞻所繫，一半也是因爲各高級官吏爲國賢勞，不得不有這種好的房子，給他們舒服舒服，好給國家多出一點力。這難道說不是應該的麼？

見了雲皋之後，述了來意，談到國事，我不覺得又興奮起來了，老淚縱橫，不能自己，勉強收淚，要他帶着去找陸一。到了陸一的「公館」，在外廳坐下，我又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張望了一番，心裏暗暗地驚道：真是很好的結構。房子的建築完全仿中國皇宮式，而院落寬大，極亭榭山石花木魚鳥之盛，心裏在打算：這一所房子究要多少錢呢？陸一來了，我又不好問，陸一也對我說，我本用不着這大的房子，現在差不多做了我們留俄同學的俱樂部了。陸一我們本是熟人，當他在上海大學的時候，我也在那兒教了一個短時期課，不

也大半都是政府的高級官吏。一半爲的是觀瞻所繫，一半也是因爲各高級官吏爲國賢勞，不得不有這種好的房子，給他們舒服舒服，好給國家多出一點力。這難道說不是應該的麼？

見了雲鼻之後，述了來意，談到國事，我不覺得又興奮起來了，老淚縱橫，不能自己，勉強收淚，要他帶着去找陸一。到了陸一的「公館」，在外廳坐下，我又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張望了一番，心裏暗暗地驚道：真是很好的結構。房子的建築完全仿中國皇宮式，而院落寬大，極亭榭山石花木魚鳥之盛，心裏在打算：這一所房子究竟要多少錢呢？陸一來了，我又不好問，陸一也對我說，我本用不着這大的房子，現在差不多做了我們留俄同學的俱樂部了。陸一我們本是熟人，當他在上海大學的時候，我也在那兒教了一個短時期課，不

從石璋那裏得知獨秀的住所，下午，我和Lily Ethel夥着潘先生便去找獨秀。潘女士在涼臺上看見了我們，馬上跑下去告訴獨秀說：Lily她們都來了！獨秀不相信。這時電鈴已響，獨秀跑下樓來，開門一看，真是我們，他笑嘻嘻地道：

『怎麼！大個子，你們怎麼也來了！從那裏來的！』
我說：

『我們來了，打粵漢路來！』

『噯呀！怎麼！你的頭髮都白了？』

『噯！頭髮都白了！』

『你呢？還好！但是清瘦得多了！』

『你也瘦得可怕了！』

說過這些話之後，我簡單地介紹潘先生給他之後，便把我們這次從香港到南京來的意思告訴他。他略略地對於這一問題加以商討之後，就和潘先生開始談話，但態度非常慎重。潘先生以記者的資格問他對於這次抗戰的前途有如何的估計，他遲疑了半天，忽然衝口而出地道：

「我看，弄得不好，中國說不定要做阿比西尼亞？」

潘先生聽了這句話，似乎有點茫然，插口道：

「阿比西尼亞！」

「唉！」他答道，「阿比西尼亞！因為阿比西尼亞的抗戰只是皇帝的抗戰。他不許老百姓起來，沒有民衆做基礎，結果，只有慘敗。中國的抗戰，就現在的局勢說，也只是單獨的軍事抗戰，雖然有全國一致的號召，但民衆終因種種扞格，不敢起來，不能起來。中日兩國的戰爭，

若從單純的軍事對比來觀察，勝負之數，非常明顯，不待討論！」

他們的談話很詳盡，我所記的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他們談過之後，獨秀又把他對於這次抗戰的態度和我談，大意是：

這次戰爭無論是由何人領導，全國各黨派都應該積極地予以贊助，無論政府之決心至如何程度，在野一切黨派都應該召全國民衆來擁護這一戰爭到底。我們參加這次戰爭必須有如左之綱領：

(1) 在野各黨派及全國民衆均應有一切政治上的自由；

(2) 武裝民衆，聯合蘇俄，抗戰到底；

(3)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貪污官吏和奸商的財產充軍費，以減輕一般平民的担負；

(4) 禁止工廠主用國難名義加緊向工人壓榨，致危及革命民衆

的生存權；

(5) 解決土地問題，解決農民一切切身痛苦，使佔國民大多數的農民自願的參加戰爭；

(6) 戰後立即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

(7) 迅速召集民主的國民大會以集合全國抗戰力量，幷主持和戰大計。

上述的獨秀先生這些意見，在南京時，和一班朋友談過，但是具體的意思乃是在武漢各公開集會上和各記者的記載中才先後發表的。我想人們對於他這種很適合抗戰需要的綱領式的意見大概不會反對罷。

第三天早上，在第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十年不見的老友葉劍英先生。我和劍英結識是在九江。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事了！當時他在第

四軍當參謀長，軍長爲黃琪翔先生。我任第四方面軍秘書處長。第四軍屬於第四方面軍，廖乾五任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兼第四軍政治部主任。我以這等關係，住在第四軍軍部，下榻乾五處，因此劍英和我時常見面。常在晚風息息，夜深人靜時，我倆乘着小艇，伴着一位青年女郎游湖，往往露宿艇中，通宵不歸。我們談天，所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問題都談到；又談到黨的問題。他善於泗水，我雖屢屢嘗試，都因缺乏勇氣而終於失敗。劍英那時就傾向我們，廬山會議（汪精衛先生，孫科先生，張向華先生，黃琪翔先生，蔡廷鍇先生以及劍英等）本要他下山來逮捕乾五和我（自然，張向華也沒有決和我們爲難），劍英把話告訴了我們，我們第二天便別了劍英，乘車到了南昌。不然的話，我與乾五早已到了枉死城裏去了！十年後的今日，我們又在南京相

會，這是多麼令人深思的事呵！他比以前更深沉了，說話更持重了，額角上面和眉宇之間蘊蓄着一些皺紋，隱隱地表現出他十年來萬里長征，艱難苦鬪的經歷，而他那兩個不大移動的眼睛的深處，實已把他的火山似的熱忱和英勇的氣概毫不隱藏地表暴出來了。我們的政治意見在某些地方雖不能一致，但我從心眼裏面承認他是一個具有政治頭腦，而又不熱中於榮名的革命軍人——一個極有希望的革命軍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追述

七 于右任先生家的一餐飯

我到南京見過王陸一先生之後，便托陸一轉致于先生，約期往訪。當時于先生不常在城內，往湯山的時候多；又因時常受到空襲的紛擾，黨國元老的行蹤更不得不極端慎重，若是朋友拜訪的話，那是難以見面的。

一天上午十點鐘的光景，陸一先生派了一位朋友張先生坐着汽車到我旅館（外交部對面新安旅館）來，說是于先生回來了。於是我們就坐了車，不到一兩分鐘就到了，纔知道于先生的公館就在我們旅館的旁邊。我很懊悔，這麼一點路，大不該勞人家擎龍捉虎的用汽車來接，但

陸先生的好意，我不能不感激。

于先生住的一所很小而又樸素的西式房子，雖然門口也有一個衛兵荷槍而立，但是門禁並不森嚴。張先生一直把我引到客廳裏邊，坐了一會兒，于先生下樓來了。彼此拉拉手，我道了來意，又寒暄幾句，便坐下了。剛剛要稍微談談的時候，客廳裏已擁進來好幾位客人，聽他們的談吐，自然都是陝西口音；他們那樣親切的談吐，細細的聽來，又知道都是三原人氏——于先生的親同鄉。過了一刻，又進來一位五十來歲的高個兒，于先生介紹說：『這是焦易堂先生。』我看于先生的事很忙，而且行動和言談都表現出弛緩和不大靈便的樣子；臉上的精彩不但不像在上海大學的時代那樣煥發，並且較之一九二七年在漢口的時候也差得多了；眼光泛出一種灰色，翻動也來得遲滯了；當我同他說話時，他的

注意力似乎不大能集中了。我恐怕妨害他的燕閑和同鄉話舊的機會，遂起來告辭。于先生站起身來張着兩隻手做勢一攔道：『不要走，就在此地吃便飯。』隨口便喊僕人預備兩瓶啤酒。

不多一時，陸一也來了。一回，馬相老的媳婦馬夫人和他的孫小姐也來了。馬夫人從手包裏取出一張支票和一包金首飾，恭恭敬敬的交給于先生：『這是五百塊錢的一張支票，這是我們一些金飾。伯伯說，他這幾個月不吃補品，並且減膳，省下這一點錢，捐給抗敵後援會做經費。並且說，「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你們婦女那邊有心去裝飾，趕快把你們的金首飾一塌刮子獻給國家吧。」我們特地遵老人家的命，送給伯伯，請伯伯代我們轉交到代收此項款子的正當機關。』

于先生思索了一回，說道：『我這裏並不收這些東西。無已，我寫

一個介紹信給中央日報，請你親送給中央日報去吧，因為那兒負代收這種愛國捐的責任。」

于先生寫了信，交給馬夫人。我等他說完了話，才同馬夫人攀談。她們上來認不得我了。我通報姓名並加以說明之後，她才笑道：『原來是高先生。爸爸常常提到王先生，不是常常提到高先生。』

我問了老人住址以後，她們辭去了。不久，便開午飯。午飯是在客廳對面一個小廳吃的。我吃了先生這餐午飯，是我平生作客的一個新紀錄，我非常滿意。因為一來我是北方人，于先生家的飯食正合我的口味。饅頭，餅，紅米粥，樣樣都是我十年亡命所日日夢想而不會嘗到的；他們的小菜是不用說了，樣樣都對勁。二來是特別引起我的興趣的。是于先生飯廳裏那張特別裝備的中西合璧的餐桌。餐桌是方的，上面放

了一塊圓形厚玻璃，當中有一個白銅軸心，可以隨便打轉，上面放的小菜，你要吃那一樣，只要把圓玻璃一轉動，便可將牠轉到自己面前，非常便利。這種裝置，可謂獨具匠心。這個飯桌和這種飯食，實在勾引了我，恨不得我要天天來作食客。直到現在，這個特置的桌子和這種北方的麵食，還常常令我回憶。牠的魔力真大呵！

在上海大學的時候，于先生在同與樓請過我吃過一餐飯，在座的有一位客人是葉楚傖先生，那時我剛回國不久，在上大担任政治學的講演，並在上大高中任課，我們在席間的談話，至今我還記得一個大概。我們會談到章太炎先生，我很說了許多不能原諒章先生的話。到了今兒，事過境遷，却仍不能抹煞這種慘慟的回憶！後來在武漢，我送了他一部剛出版的我的『白話書信二集』，他曾埋怨我書中有一處不該對於

某先生大加批評，埋怨我的態度不對。到了現在，更不能不引起我的慘慟的回憶！

五卅運動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前哨戰，而担任這個前哨戰之領導使命的，就是上海大學。上海大學是中國第一個民族革命大學，牠的許多學生都進了黃埔，在北伐戰役中露頭角，此後在十年的內戰中也發生了偉大的作用。于先生一生的革命歷史自然是很多，但是上海大學却是他的革命事業中最光輝最蓬勃最燦爛的一頁。據說他在莫斯科會自豪地對人說道：我辦上海大學，是對壓迫者放的一顆炸彈。誠然誠然。希望于先生這樣的炸彈，比牠更大的炸彈，再多放幾個，因為現在是萬分需要，但不知于先生究有餘勇可買否？

八 陵園訪問馬相伯先生

我們老早就要去訪問馬相伯先生，但是到了南京二十多天以後，才算了却這樁心願。其所以遲遲的原故，第一，因為十餘年的政治逃亡的生活，各方面的朋友都不能會面，此次到京，許多舊友聚集在此，天天都有朋友來談，我也天天忙着去看朋友，不覺得過了一天又一天。第二，因為老人住在『陵園』，距我們的寓所太遠，步行去吧，耽擱的時間太多；坐汽車去吧，所費又不貲。這一層，我們也太費躊躇。但是我們終於決定了，那天早上，我們一家二口夥着潘先生雇了一輛馬車，並且預備先去謁陵。

陵園即孫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地，這裏的風景實在幽勝宜人。中山先生的陵墓不消說，是非常雄偉莊嚴；明陵本來也就很偉大，然以紫金山坡上的『總理陵墓』視之，則明陵的規模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但是牠那兩旁的翁仲還是好像很驕傲地表示道：『三百年前，我們不也是這樣地威風麼？不也是這樣的光榮麼？又誰知，到了而今，時異勢殊，相形見絀呢？』我們的車到了陵園山下，大家下了車，高高興興地踏上瑩階沒有兩步，便被一個荷槍的衛兵大聲止住：『現在禁止遊人！』說着，用手向左邊一指道：『請看！』我們抬頭向左邊一看，樹上一個木牌，果然寫道：『軍事時期，暫禁遊覽！』

大家都很掃興，只得改道陵園村，大家打算步行走到馬老先生的寓所，車夫說：『路還遠着咧！』我們不得已，又重新登車，車夫揚鞭前

進。陵園一帶的風景着實不錯，路兩旁的柏樹與灌木種植得非常整齊，柏油的路令人羨煞，又令人妬煞！

原來南京的路是有差別的：當中的路是柏油鋪的，兩邊則只敷以光石子兒。柏油路上只許汽車；馬車和人力車却没有分兒享這種權利，牠們只能在粗石子上顛簸着，因此也就影響到坐車子的人。我們只能看着汽車在柏油路上風馳電掣地橫衝直撞，那些紳士們，小姐太太們，坐在裝置彈簧的車墊上，當他們的車子在柏油路上飛跑着的時候，他們從窗中一眼看到我們這些坐在馬車和人力車上的人，自然是很驕傲的，看到這些拉車的和用他們各人的兩條腿在石頭路上蹣跚的人們，更現出他和她們那樣睥睨一切的微笑道：『你們這些蠢材！活該！』

車夫忽地一聲道：『到了！這不是□□號嗎？』

把我的思想打斷了！我們下了車，進了門，便向看門的問道：『這是李公館吧？』

『是的，這是李公館！你們找誰？』有人答道。

我們告以來意，說是要會馬老先生。馬老先生自己並沒有房子在陵園新村，既名曰李公館，分明是借住的了。原來這個公館的主人就是李烈鈞，李協和先生。我又想到我和協和先生一段因緣了。當辛亥革命初起時，江西繼武漢而舉義旗，安慶又隨江西之後，宣布獨立。那時亡友韓著伯，吳暘谷，李筱南，管鯤南，李孟平諸先生都是安慶獨立的主動人物，我也奔走其間，盡過一點一滴的力量。後來吳暘谷因安慶的革命軍的力量微弱，皖撫朱家寶雖被迫而宣佈獨立，其心叵測，不能不防。其時先生以潯陽大都督開府九江，吳因向之請兵，先生遂命黃煥章率所

部開皖幫同鎮壓。但是黃煥章的隊伍原來是老巡防營的底子，有一點革命的政治意識。到了安慶之後，雖然驅走了朱家寶，但是他的軍隊一開進城，秩序便受大影響，劫掠時有所聞。吳錫谷覺得對不起鄉人父老，當面嚴責黃氏，觸黃氏怒，吳遂見害。我們正在組織北伐隊，以桂先鋒，胡萬泰所部爲中堅，設北伐隊臨時機關於近聖街徐朗僊的舊第。吳氏被害後，黃便想清除我們這些積極份子；我們便設法逃出省城，隨着胡萬泰的軍隊駐紮集賢關，一面派人赴武漢及九江報告黃興和李烈鈞。李氏因自己的隊伍鬧了亂子，遂親自來皖處理；他與胡萬泰爲日本士官同學，又看見皖中革命的空氣很濃厚，不可侮，遂悄悄地於第二天帶着黃煥章的隊伍走了。我們臨行時，還由蒼伯先生主稿寫了一封具有歷史意義的信給李氏。忽忽二十幾年了，當時一些同志，十九皆亡故，

李先生還健在，我也苟活人間，今天到了李先生的公館，過門而不入室造訪，未免遺憾，……我這樣一剎那的回憶還未了，忽然看見了馬夫人和馬小姐。

我便上前打過招呼，同時又介紹了我的夫人和姪女和她們相見。她們連忙把我們向客廳裏讓。一方面馬夫人便跑了進去，幫着用人把馬老先生扶了出來，且走且叫道：

『伯伯！高先生來了！高先生來了！……』

『那個高先生？』老人問道。

『唉！就是你常常說的那位高先生！』

說着已經走到了客廳，老人的記憶力還不錯，一看見了我，便喜笑顏開地連忙叫道：『好了！好了！我們又會面了！……』

我把內人及姪女指給老人看，他們行了鞠躬禮之後，老人又很高興的對着我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是某人了，不過，那時你不願說出，我也只得不響！』

這話怎講呢？原來『一二八』以後，全國抗戰情緒異常激昂，政府方面雖爲種種關係，不得不加以制止，然而青年的不安越發利害，尤其是上海。上海各校及各機關的青年，最堅決的是復旦大學，馬老先生對於他們的行動抱着最大的同情，並大聲疾呼地勸政府予以援助。其時天津益世報（中國天主教的機關報）特請先生每日發表一篇談話，對於時局，盡力指導，因在該報特闢一欄曰『九七老人的一日一談』，執筆爲之記者就是我。我那時爲避免人家注意起見，另外起了一個別名。每天五點鐘就起來，從匯山路坐車趕到徐家匯，已經要在六點多鐘，七點鐘

和老人同進早餐，夙興夜寐，風雨無阻。後來益世報的『一日一談』因政府之通告而停刊，旋又爲南寧民國日報繼續發表『一日一談』。老先生每逢和我談話，非常高興；他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見解，自然我們不能強同，但是他那一種對於國家民族的熱烈的深愛，真要使我們許多中年人和青年人愧死！他曉得我的真姓名，却裝着不知道，他說：『我信宗教，所以我能安心立命，你不信宗教，你却也能獨立不倚，這也就奇了！』我總對老人報之以微笑，因爲我不敢多說，恐過傷人的精神。而今異地相逢，舊事重提，大家真是悲喜交集！我們教小姪女立人站在老人跟前大聲高唱救亡歌曲，爲老人祝壽，老人樂不可支地對立人笑道：『恭喜你！恭喜你！因爲你有一個好父親！』

老人又復大聲道：『你看！我們有了這樣出色的小孩子，中國怎會

亡國呢？但是轉而一想，若是國家被我們這些老年人弄亡了，那又怎樣對得起她，……她們這樣可愛的孩子們呢？……』

我們怕老人傷心，咬着牙，連忙忍淚，辭別老人，並安慰他道：

『老先生！話說得太多了！休息休息吧！我們改日再來看老先生！』

（一九三七年十月）

九 抗戰與農民問題

——與某部長談話的回憶——

某部長先生本是黃埔的舊友，我到了南京以後，朋友們告訴他說，我來了，某天下午，他要友人某先生約我談話，遂同他一陣到了常府街十八號（？），在一間小小的客廳中和LF先生相見。我們一別十餘年，若果沒有人介紹，或許彼此都不認得了。我們稍微道過寒暄之後，便開始作正式談話：（茲以『A』代某部長，『B』代予，下均仿此）

A：語罕先生這些年都在什麼地方？

B：這些年都住在上海。

A：常時做文章吧？

B：是的，因為要生活，只得寫寫文章。

A：近來有什麼著作嗎？

B：這兩年來，因為我所譯著的書籍大半被禁止出版，文字生涯已是末路，除了在報上替人寫點不必要的東西，沒有什麼較有系統的著述。

A：這一次是打那兒來的？

B：從香港來。原來一向住在上海，只因上海救國運動發生，我雖沒有加入救國會，但我也不能再牢坐在書齋裏，有時也出來幫着朋友們跑跑，因此引起了公安局或特務隊的注意。去年七八月間，有一次被偵探跟上了，後來不知怎的，他又把我丟了。到了一個被捕的朋友從南京

陸軍監獄出來，跑到上海，對我一個親戚說他在陸軍監獄的遭遇，才知道那位把我丟掉不管的偵探，因此吃官司，判了八個月的有期徒刑。原來他看我這大年紀，還有什麼作用，而且也不像一個革命黨，但另一包探疑他受賄，遂控告他，致遭此難……自此以後，我的行動便又謹慎起來，精神上頗感不快。適逢香港方面的友人辦了一個日報，要我去幫忙，我便跑到香港。

A：什麼時候打香港動身？

B：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乘廣九車到廣州，當晚即乘粵漢車北上，二十六日下午抵武漢，二十八日買輪東下，三十一日到南京。

A：先生對於這次抗戰有什麼意見？

B：我首先得聲明：此次回國完全激於抗日救國的義憤，我的思想

雖沒有絲毫動搖，但此來目的專在抗日，毫無黨派成見。在堅決抗日的條件下，我個人絕對擁護蔣先生的抗戰的領導。惟其如此，我不得不很忠實地把這次沿途的見聞和個人的感想陳述出來。從廣州到長沙沿粵漢路各處只看見軍隊的調動，絲毫沒有看見民衆熱烈的參加，恰恰相反，民衆對於這次戰爭的態度非常冷淡，除了各車站張掛着極稀有的白布寫黑字的懶洋洋的標語外，什麼也不見！武漢三鎮也沒有例外。從武漢到南京沿江幾個碼頭，如九江，如安慶，如大通，蕪湖，自然也是一樣。因此，這次戰爭只是單純的軍隊在和日本動員了全國的軍隊作戰。照此情形，中國的勝利前途是毫無把握的，誰也知道單是我們的軍隊和日本的軍隊對比，勝負之數不待著龜，自然是操於日本了。因為我們恃以無恐的，是我們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但這些人民必須組織起來，武裝起

來，力量才能發生，不然，不過是四萬萬五千萬頭駟羊而已，有什麼用處？

A（很誠懇地向着我）：中國的社會發展得太慢，工人太少，最大部分的人民都是農民；農民根本就不曉得愛國，但是我們都不灰心，還是要以最大的努力，從事宣傳。

B：依我個人的研究和經驗却不然。農民誠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所以大家都以為農民的文化程度太低。但是我們要知道，農民工人的文化程度不能以他們所受的學校教育來做衡量的水準，而是應當以他們對於政治的實際認識來做衡量的標準。他們固然不懂得什麼公民學，不懂得什麼國家學，不懂得什麼叫做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以及國民革命等等的名詞，但他們却懂得事實，就是說，他們不是理論家，而是實際生活的

實踐家。他們在實際生活的經驗中，可以判斷這個國家或政府是於他有益抑係有害；于他們有害的國家或政府，他們是不歡迎的，他們也就不擁護，因而對之冷淡；于他們有利，即代表他們的利益而奮鬥的國家或政府，他們是加以熱烈的擁護的。我們拿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來說吧。法國這一次的革命乃是第一次最偉大的資產階級的革命，牠分給農民以土地，後來王黨勾結外國君主聯軍來攻擊革命，法國的農民大眾及巴黎的市民便拿起武器來擁護牠，終能打退全歐洲封建君主之反動的聯軍進攻，保障了這一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若果沒有偉大的農民大眾積極參加，那內而白黨，外而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早已把方在發提的蘇俄消滅了，那裏還有今天？土耳其也是一樣，基馬爾若果沒有農民擁護，又那裏能完成土耳其民族自由獨立的大業？而且我們已身的

經驗更可寶貴。先生和我都是親身參加北伐戰役的人，親眼看見那時各處戰役的農民之熱烈的參加。他們教他們的子弟很踴躍地投到革命軍中來，他們自己自動地担任一切前後方的工作，所以能使人數不滿三四萬而器械廠敗的國民革命軍，疾風之掃秋葉似地，摧敗了久經訓練，兵器犀利的數十萬北洋軍閥的武裝。

但是為什麼那時的中國農民那樣熱烈的參加反軍閥的內戰，而現在對於對外抗戰，却反這樣冷淡和旁觀呢？問題並不難了解。民國十一年以後，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經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劃時代的革命宣言與適合工農大眾之政治的經濟的要求的政綱。全國工農大眾都相信這個政綱是於他們有利的，並且相信這個政綱是一定可以馬上實行的，所以他們拚死命地來擁護國民革命的北伐。但是不

幸得很，十餘年來，因種種關係，演成自相殘殺之局，這一政綱依然是白紙上寫黑字，沒有機會來兌現，而政治上之不能如意的事十常八九，使農民對於這個國家只感到痛苦和憎惡，沒感到什麼可愛，他們的原始情緒遂發生這樣一種感想，以爲：現在的國家或政府來統治我們，我們是這樣地無以聊生，就是日本人來了，我們也不過是無以聊生，遂有『牛羊何擇』之感，這並不能怪他們。我們現在不能諱疾忌醫，我們知道了這個病痛所在，便好對症下藥。首先我們要曉得：現在的農民絕不是什麼口舌和文字的宣傳所能收效的了。我希望先生等在政府方面，從實際政治上，馬上做幾件有益於人民大眾的事件，『一個雷震天下響』，比什麼宣傳都好，包管農民大眾不招而自來，他們會肩摩輟擊歡天喜地地投到抗戰的旗幟之下，絕對不會再有今日避之惟恐不速或望而却步的

現象！……譬如南京吧，我們自然應該保障首都，防衛首都，但是現在的南京却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巴黎大不相同。巴黎那時有幾十萬革命的小市民（手工業者大多數），南京除了軍警，特務隊和公務人員之外，沒有同巴黎一樣的革命民衆，有的，只是些流氓和漢奸。假使前方戰事失利，軍警特務隊失却鎮壓的力量，公務員一逃，政府動搖，漢奸夥着流氓便出來統治南京，這是多麼危險啊！

A：不過，所幸這次全戰綫的將士都是不惜壯烈的犧牲，士氣奮實可用，……

B：誠然！這種士氣自然是最高當局的訓練有方，有以致之，而九一八與一二八以後的全國民衆抗日情緒實爲其重要原因；下級幹部和士兵的奮勇直前之氣，完全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但是人總是人，不是鐵打

的，在過甚的傷亡之後，到了某一時期，若果後方民衆運動沒有充分的努力，那就必然遇到嚴重的危機。（A先生很動容）

A先生聽到這裏，非常注意，雖未表示意見，但我覺得至少他已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值得考慮。我也就把這個問題做一結束。恐怕他的事多，正待要告辭，他便向我道：

『語罕先生要見見委員長嗎？』

我很莊重而嚴肅地答道：

『我曾在黃埔任職，本是委員長的舊部，中更多故，十年睽違，論理應當見見，慰此飢渴。但是我現在是一個草茅下士，蔣先生担負國家重任，一日萬幾，實不敢以閑散之身紛擾他的宵旰憂勤，現在鄭重地請蔣先生在蔣先生前代達微忱，敬祝蔣先生的健康！』

A 先生又問道：

「語罕先生願否担任什麼工作？」

我又鄭重而誠懇地答道：

「我很知道我自己。我在教育界或所謂文化界，就是以平民的資格做社會的活動，還可以相當有點作用。若在政府機構內任事，一定弄得很糟。所以我打香港動身的時候便拿定主意，願以平民的資格，用某一點一滴的力量在社會方面，參加抗戰的活動。在堅決抗戰的條件之下，絕對擁護現當局的領導。自然，我的政治信仰，並沒有改變，而數年以來，並沒會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此後一切言動，都集中於抗戰，政府方面，當可諒其無他。我此次來京純是我個人行動，我的說話並不代表任何黨派，但我敢說（用我的人格來担保），只要政府堅決抗戰，沒有一

個人願意並且能喪心病狂地來反對政府，除非他是漢奸。但是有一樁：友誼的忠告和愛護的批評，萬不可把牠當做有心搗亂，與漢奸相提並論。……』

說到這兒，我便告辭，A先生送到二門口，我便辭住。他，他看看我的頭髮說道：『語罕先生的頭髮白得比從前多了！』我不由得向他頭上瞟了一眼，深深地答道：『是的，但是LF先生的頭髮，也花白了！』

一〇 到安亭前線

我和張文伯先生本爲黃埔舊同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的廣州事變中，我們在黃埔曾經做過一度的難友。原來那時我在黃埔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時汪黨代表精衛要我到入伍生部任少將階級的黨代表（入伍生部長爲方鼎英），我因爲初回國，一股熱氣使得我急不擇言，說了些不必要的很幼稚的話和做了許多很幼稚的演說，引起了各方面的誤會，而三月十八夜的軍事當局的逮捕令的目的，據說在黃埔學校是鄧演達，嚴立三，張文伯和我四個人，所以我們總算是難友。而且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家，我和文伯在私人的交情上並沒有一點裂痕，但是十年來的不幸的內

戰終於把我們隔開了，始終沒有通過音問；但承文伯的不棄，他時常對上海的朋友表示記望着我，朋友告訴我，我也不敢和他通信。直到去年大戰既起，我決定回國請纓，沒有川資，不能動身時，才打了一個電報給他（致南京警備司令部），好久沒有回電，又打了一個電報到上海，由黃炎培先生轉，但是那時港滬電報來往非一星期不可，歸心似箭的我自然不能等，便倉卒僱眷回到南京。到南京後，我便由政訓處鮑佛田先生處轉一電給文伯先生，旋得了他一個覆電如下：

（前略）前會電覆，聞到京，甚喜。請即來前方傾談。先在蘇州下車，到留園本部留守處。弟已另電盛主任接待，並派車護送矣。弟張治中叩。魚。

我接到電報的後兩日，便同公昭上了滬甯火車。二等火車上的人並不

多，十有八九都是軍人和其他各機關的公務員。車行很慢，我們在車上沒事只好看看報，談論着敵機轟炸和漢奸的活動，不知不覺到了鎮江，車站來去都是兵，傷兵車中傳出來的呻吟聲，打動了我的心弦，周身的脈搏非常緊張而跳動。童子軍和某某區黨部歡迎傷兵的旗幟高懸在站臺上，人人面孔上皆帶着緊張的表情。車要快開的時候，兩個押車的憲兵，忽然用繩子縛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窮孩子上來了。這孩子穿了一套老白布小褂褲，態度很鎮靜；憲兵問他的姓名籍貫以及在鎮江的住址，他一概不答，又把手裏的一盒自來火和一尺來長的引火繩審問他，道：『這些東西你帶在身上做什麼用？』他一聲不響；又問他道：『你在車站上東張西望做什麼？』他還是做啞巴。憲兵氣極了，解下了腰間的皮帶子，沒頭沒臉地抽了他好多下，雖然他不過是一個小孩子，但是他那

種神態，不但引起大家的同情心，反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憎恨，衆口一詞地呼道：『打殺伊！』他却一點不慌張，好像是受了很久訓練是的。經過好久的審問，沒有結果，而蘇州車站已送入我們的眼簾。車站已經被轟炸得不像樣子，但是牠却沒有現出牠那不勝痛苦的神情，還是帶着創傷表示出很驕傲的神氣。

我們下了車，坐上馬車，直向來電所指示的地方馳去，到了留守處，已是下午一點鐘的時候了。見了威主任之後，我們便被引到張總司令的臥房內假睡了兩個鐘頭。威主任把公事處分完畢，便過來同我們攀談，才曉得他也是合肥老鄉，保定軍官的學生，爲人非常誠懇，說話也極篤實。談到戰事，他頗不以固守上海近郊爲然，這一層我很同意他的見解。談了半天，勤務兵請我們出去吃飯，到了飯廳，才知道他備了很

豐盛的酒飯款待我們。

我們飽啖了一頓，又過了一點鐘，便坐了備好的專車走上了我們新的征途。大汽車在黑夜中，一上一下地顛簸着，慢慢地向前衝，大概有三四個鐘頭罷，車停了。伴我們的衛士把我們送到附近村莊一間小草屋中，輕輕的叫道：『童附官！高先生來了！』一位小個兒的軍官走上前來很親熱地歡迎着說道：『高老師來了！我們盼望得好久了！現在可好來領導我們奮鬥了！』一面便叫衛兵趕緊吩咐把汽划準備好，他陪着我们上了汽船，把我們送到總司令部——這裏就是安亭車站的近旁。

這時已是十一點鐘的時分。進了總司令部，看見文伯先生，他實在是太辛苦了，滿臉的睡眠狀態，旁邊的電話機不斷地響着，他不時地要接電話，前方的消息在不斷的雷殷殷的砲聲中傳達了來。他吩咐了前方

由電話請示的官長幾句話之後，轉過身來，同我談話，時間，環境，以及戰時緊迫的情形不容許我們做無謂的寒暄。我介紹公昭給他以後，我們便匆促地做了如下的談話：

(張)你回來很好，我已預備打電報匯幾個錢給你做川資！

(高)我在香港連打兩次電報，一次寄南京，一次寄上海，又有一封信寄江陰友人轉，我等得不耐煩，摒湊，摒湊，便回來了。

(張)好極！好極！你去見見委員長好了！

(高)委員長如此的寶貴時間，我如何敢以閒散之身去打攪他？請先生代為致意，他日有機會再去請謁罷！論理是應該見見的。(話說到這裏，我又望望文伯先生的精神，實在有點不

忍，不知不覺地坦白地說道）我看你實在辛苦得很！我可以幫你的忙嗎？假使有可能的話，什麼名義都不要，我們老朋友！

（張）（這時他沉吟了半晌）這到要先同委員長商量好，因為委員長對於以前許多因政治關係而分離的老朋友的處置有一個一定的的方式，譬如某某某，我看你還是先見見委員長的好！

說到這裏，我祇好報之以苦笑，這時我的內心很起了許多波瀾，然而我很了解文伯對我說的話，沒有半點出於敷衍，着實是實話。我本來爲抗戰而來，難道還有絲毫不可告人的骯髒心思！我們又談了些別的話，便退到祕書處休息。出門遇見黃副總司令琪翔，他也是多年不見的老友。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時，我跟隨第四集團軍（張向華所統率）到九江，卽下榻他的司令部內，那時他是第四軍軍長。彼此握握手，他就跟到祕

書處來，高談闊論地暢敘了半天，走了，於是接着又同幾位新舊朋友談心。第二天晚上，又同文伯談了一次話，我便就此告辭。第三天一大早，坐了總司令部的大汽車回到蘇州。到蘇州後，便一直到車站搭車回南京。

回到南京以後，公昭便把我們到安亭去的見聞，寫了好幾篇通信，預備寄到香港報去。我因為這種記載動輒與軍事有關，要求他先將稿子給我看過，然後抄發。他是一個可畏的青年新聞記者，把很豐富的事實表現在他那熱勃勃的抗敵情緒的字裏行間，這是沒得說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他所敘述的安亭景物足以給敵人以判斷我們的軍事要點的資料，我把牠一齊刪去了。這種毛病，很多有名的著作家都不能免，如某名流在上海報上發表他和張向華總司令的會見的大作，就會極力描寫向

華先生的總司令部：某報記者在徐州，也會加意描寫他和李白會見的花園，教人一望而知是徐州的花園飯店。——這真不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一一 到上海前線

張向華（發奎）總司令，我們共過一回事。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時代，他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要我去任祕書長，我幹了一個月，而國共分家之變作；那時漢口便有逮捕C.P.分子的動作，向華要我跟他的隊伍到九江；『廬山會議』也有同樣的議決案，我不得不離開九江，跑到南昌，當晚即逢『八一』之變，我又跟着大隊到了廣東；此後十餘年便在上海過着隱遁的生活，除讀書賣文外，不會參加其他實際政治的活動。民國廿五年因賣文到了香港，抗戰既起，我回到南京，聽說向華先生在浦東担任總司令，便想去看看他，於是就寫了下述一封信給他：

向華總司令：

內戰把我們隔隔了十多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却又把我們打成了一片。中國人老話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西方革命家也說，『革命須待反革命的鞭策』，都可說明我們這次抗戰是翻開偉大歷史新頁的一個破題兒。先生適在這個戰場上任了一員開路的先鋒，我們這些以前的戰友，自然都很引以為榮幸！并對抗戰前途增加不少的信任。我前次去看文伯先生時，本來就想來看你，但因交通上沒有人指導，而文伯又忙於作戰；我不敢多麻煩他，故悵悵而返。現在還是想來看看你，藉話十年闊別的情懷，如可前來，請即電覆，并希指示取道何處，到何處接洽，以便前往。函電請由政訓處袁處長轉為

荷。

弟語罕。

過了幾天，鮑佛田先生送了一封電報給我，就是向華先生的，電文如下：

（上略）袁處長企止兄譯轉高語罕兄鑒：手書奉悉。多年闊別，結想爲勞。現駕抵京，并擬蒞此，喜極欲狂！盼即命駕。經路請詢企止兄爲荷。張發奎。梗。

接電後，我自然是歡欣鼓舞，但是，車找不到，過了幾天，適逢老友朱蘊珊和徐午陽要乘別動隊的軍用車到上海去有事，我便和公昭搭他們的『專車』踏上了我第二次的前線征途！

十一月二日下午兩點鐘從南京出發，軍用卡車的滋味，我是嘗過了，但這次特別的有趣，汽車公路因戰爭的恐怖，失了修理，沿途的高

凹不平，使得偌大的汽車跳起舞來。蘊珊警告我們說：我們的身子要隨着牠的高低而上下，便不會過於同牠相撞。經驗證明了老蘊的話不錯，雖然兩手，尤其是右手吃苦不小，但是總算找到了適應汽車顛簸的法則，我這副老骨頭沒有被牠撞破，總算萬幸。不過另一遭遇却使我們一路叫苦。原來這幾天陰雨連綿，把敵機限制住了，沒有十分的活動，我們行路是很安全的，這自然是十分幸運；但是雨下得太太久了，坐在蓬車前頭的我們，完全被雨浸透，身上着實難過。

車到了距上海不遠的某地，忽然發生障礙，大家下車一致推動，終於無效。問司機離上海好遠，他只含糊地說不過二五公里。這時天已亮，砲火逼近我們的路旁，我們商量一下，決定徒步前進，在泥濘中努力向前，整整走了三個鐘頭，到了九時才蹣跚到徐家匯。我們看看自己下

半截身子，都變了泥人，半天一夜的顛簸，三四十里的爛泥的跋涉，着實有點疲乏。便提議先到浴室洗澡，在浴室中吃點心，然後再找旅館。大家同意，於是我們就一車打到大世界對過的『溫泉』。出浴室時，已經是一點多鐘了。

一到上海真是令人感覺得異樣，一方面是：

『飛機還在不斷的扔炸彈，

大砲還在隆隆的響！』

前線上的戰士們在用着他的血肉對敵人拚命作戰，一方面茶館，酒肆，旅社，歌場，還在那兒拚命地享樂，尤其旅館中『又麻雀』的聲音四面襲來，終夜不停。這種聲音刺入我的耳鼓，比敵人的砲彈打在我的心坎還要慘痛。他們這樣絕對地需要享受，敵人加於我們的那樣殘毒的飛機

大砲，自然是絲毫不能打動他們的心情；他們的心理似乎是這樣的：在中國人的統治下，咱們在租界上樂！在太陽旗的統治下，咱們依然在租界上樂！無論太陽是從東方來或是從西方來，咱們的人生是八字註定了該享這種清福的。爲什麼呢？咱們有的是錢！假使你要在旁邊湊一點趣道：

『現在抗戰中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呢！』

那他就會很不自然地答道：

『那你是傻瓜！有錢的不但不出錢，反而更加賺錢；有力的不但要出力，並且要出錢，你還不明白嗎！？……』

你看這種論調豈不活活地要把人氣死！我在旅館中從一個裏面『又麻雀』的房間走過，適聽到了這幾句話；回到房裏呆想想，忽然貫府裏的

焦大，尤三姐的聲音笑貌湧現在我的眼前。但是這個麻雀朋友說的話實在比焦尤的謾罵更深刻，更叫人啼笑皆非！

我正在默默地想着許多問題，門縫裏又送進了一兩張紅綠紙片兒！原來這種紙片兒就是所謂『導遊社』『伴舞社』之類的東西，在一個揚子飯店中就有『同樂』『泰山』『金山』『揚子伴舞社』『新生活伴舞社』『三樂』『春光』『莉莉伴舞社』『八一三伴舞社』『大中』『金鷄』『越公』等幾十個小組織，據說她們本是變相的台妓。她們甚至自己敲我們的門，一開門，她們的宣傳品便飛進來了，桃紅柳綠，五色繽紛！當她們遞宣傳品給我時，我總是很誠懇地對她們道歉，說，『對不起！沒有機會來照顧你們！』

以上所說的皆是我對於上海在戰時所見到的黑暗面；但是，大凡一

個極黑暗的地方，也就是極接近光明的地方；再進一步說，極光明的現象，就是從極黑暗的現象中發展出來的，物理的現象和社會的現象，都往往如是，這便是矛盾的法則。所以我這時的心情，的確也正寄托在這種矛盾的零圍中，暗暗地叫道：

(一)

上海呵！大上海！

你怎麼這樣地猶惡，

你怎麼這樣的醜怪！

人家在前線激戰着，

你為什麼還如此心開！

你們一聲聲的叉麻雀，

令人慘痛，比敵人的轟炸還厲害！

你們的嬉舞酣歌，

令人顫動，比敵人的大砲還要難挨！

上海呵！大上海！

你這樣地猶惡！

你這樣地醜怪！

(11)

上海呵！大上海！

你又爲什麼這樣地可泣可歌！

你又爲什麼這樣地可親可愛！

『擁護抗戰到底』，

只有你的行動表示不妥協！

『反對漢奸到底』，

也只有你的行動表現得最堅決！

你有新的微光在閃灼着，

你有新的生命源泉在暗暗地流來！

上海呵！大上海！

你又這樣的可泣可歌！

你又這樣地可親可愛！

十一月五日于上海

一二 南橋之夜

我之訪張向華（發奎）總司令也，目的固然在於：（一）話舊，然交換我們的對於抗戰的意見，（二）把後方民衆對於向華此次指揮作戰的努力之傾向情緒向之陳訴，（三）報告上海及東南民衆對於武裝抗日之迫切的要求等，實是最大目的。但是戰局忽焉轉變，我們先在敵人的飛機轟炸與準備退却的情勢下，談了二十分鐘的話，便匆匆分手。茲將這幾天所經過的大事記錄出來，以告關心我們行動的一些朋友們：

十一月八日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張總司令的上海辦事處 Y君打電話來告訴我們（徐光英，朱蘊山，潘朗和我），說是今晚可以派車送我們

到前方去，要我們六點半鐘在寓等候。我在電話中聽了這個消息，心裏只是跳躍。車子來了，我們先到了辦事處，由辦事處派了一個副官陪着我們同車出發，同時還有兩輛貨車同行。我們所行的路是逼近火線，車子不敢開燈，在黑黢黢的地平線的夜氣中，偷偷地向前開動，越過楓林橋，虹橋飛機場，沿途都看見蠕蠕而動的向着我們所走的方向進行的軍隊，也有從反對的方向開來的，但沒有去的多。砲聲機關槍和步槍聲不斷地響着，大家都屏息地坐在車裏望着前途。汽車時時在深泥中搖擺，動盪不定，經過長期的極度掙扎之後，終於到了目的地，下車後，經過一個泥濘不堪的道路，走到招待所，由招待所乘電船到總部。

到了總部，便直接到總司令的辦公室，只見向華先生站在一個長檯子旁邊，檯子四圍都站列着高級將校，正在那拿着談話機與前方各將領

通話。他一眼瞞見了我們，便請朱暉日軍長（前十一軍軍長，現任向華的參謀長）讓我們到事邊房裏坐。我們等了一回，向華來了，由我把我們的來意，一一告訴他。談到上海的民衆運動問題，民衆武裝問題，他說，事情是要做的，但是現在我們已來不及了，顧不到了。這樣我們才曉得軍事上一定有重大變化。隨後，他又接着說：

『現在我們是抱着「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決心，……現在接到蔣委員長的命令，因金山口敵軍登陸，不得不變更戰略，把浦東軍隊撤退，但我們仍堅守南市。』

我們把話說完，要他仍派原車送我們回上海，勾當未了事件。他說：

『要回上海就得趕緊走，否則路上恐怕就要發生困難。』

說時便命陪我們來的副官派船派車送我們回去。我珍重道別。向華又叮

嚀道：

『我們蘇州或南京再會罷！』

又道：

『若前途已不通，就請馬上回來，我們一陣到蘇州！』

我們坐上電船，仍到來時下車的地方上了車，疾駛而歸，但是路上退却的軍隊和車輛太多了，常常阻住了我們的去路，加了汽車陷在泥中，不能自拔。正在努力推進汽車的時候，敵機的照明彈已經亮了，不多一刻，忽然轟的一聲，一個炸彈落在我們的車子附近（大約只有十幾米達遠），把我們的車子震得幌了幾幌，玻璃也震破了。我們不得已，只得下車步行，那個副官從黑影中消逝了，我們再也找不着他了，喊他

也不聞聲息了。我們雖然沒有人領路，也只得快步前進，但是到了虹橋飛機場附近，有一個叉路，不知走那條路好，於是就詢問從那邊來的十幾個很活潑的青年士兵。他們勸我們道：『回去罷！我們是最後退却的，前頭的路已不通了！走罷！跟着我們走罷！』

我們也就向後轉走，那驍得剛一回頭，只見前面紅光燭天，四處起火，並且一個很長的木橋已着了火，正在燃燒，好像一條火龍。我們知道大路已斷，只能岔到橋的旁邊，預備渡河落荒而走，但是看見一輛貨車打那個火龍似的橋上急馳而過，於是我們又向木橋飛跑。路上我跌了兩三交，幾乎跌到深溝裏去了，賴蘊山和公昭的幫忙，終於跑到木橋，踏着橋上的烟火，跑了過來。我們算過了第一關口。

這時沿途的軍隊的秩序很不好（這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人聲非常

的嘈雜，敵機的照明彈和機關槍的掃射時時襲來，我們一聽見機聲掠我們的上空而過，我們便跑到路旁的小田裏或水溝裏伏下，一見飛機飛了過去，我們又馬上起來快步前進，計劃在天光未明之前，多走一點，雖不能趕到青浦，也要多走近一點。不多一時，天光亮了，前進不到半點鐘，敵人的飛機果然來了，我們便望稻田裏跑，一跑到幾座高墳，我和蘊山，公昭便散開，就在高墳的陰蔽方面伏下，兩個汽車夫也跑了來，我喊着要他伏在旁邊。老徐快跑到我們對面一個墓道後面，這時飛機已掠過我們上空，對着附近的長橋一連投了三次彈，機關槍不住地掃射。有些當弟兄的，還在那兒『豕奔獸突』似地亂跑，一個年輕的小夥子頭蓋上中了一槍，鮮血淋淋地，不顧命地對我們奔了來，我們喊他不要跑，伏下，他不聽，三步兩步跑到那個墓道的半圓形的門口，身子向

後，拚死命地望裏鑽。鬧了一個多鐘頭，第二關口才算過去。

這次我們不敢走大路了，由老徐領路，我們沿着小徑望前行。不到一里路遠，敵機又來了，我們又快跑到一個小小的村莊。老徐主張不到村裏去，即在村外樹林裏面，或草堆裏面伏下。我們却不論三七二十一，一頭闖進一個農家，才知道隔壁就是我們昨晚曾經到過的招待所。老徐，老朱和公昭都各找一個地方睡覺了，但是只聽轟然一聲，我們的房子的門窗戶壁都震動了，土塊玻璃紛紛下落，窗外不過三十碼的地方一家人家的房子着了火，他們從夢中驚醒。我沒有睡覺，跑到隔壁招待所去想打一個電話問總司令部的下落，電話打不通，只得在那兒等等。

飛機不斷地來去，鬧了兩個鐘頭，又冒着險開步走，因為這個地方已是敵機活動的目標，我們匍匐前進，行而後伏，伏而後行，如是不

知有好多多次，到了下午兩點多鐘，才踱到青浦東門大橋。橋已炸毀，剛被修好，通過大橋後，進了東門，東門城內，炸得一塌糊塗，許多東西炸燬的公共汽車之下，幾隻野狗，正在分食一塊剛被炸死，鮮血猶腥的人肉，我們也沒有時間來領略這種滋味，趕快地通過城中，出小西門。小西門外左近被炸彈炸踢了，走不通，只得從右邊一條路向前走。走了半晌，回頭一望，公昭不見了，兩個汽車夫也不見了，我們只得走進一家民房裏去暫時休息。敵人的飛機正在頭上盤旋，快要到太陽落山的時候了，公昭他們三人還是不來，大家只好動身再向前衝。沿途問路，據說有水旱兩條路到蘇州，我們決計走水路。

大家走到橋頭上，呆立了半天，找不到船，可巧，對面來了一位着軍服的弟兄，他看我們是軍隊長官的模樣，又知道我們正在沒奈何的時

候，上前說道，「諸位！是不是要到蘇州去？我送你們去好了。」我們就問他是什麼地方的，他說，他是兵站總監部第七分站的差船，他奉有命令押這隻船回蘇州。但是船老板只有一個人，人手不夠，這時却來了一位江蘇稅警團的傷兵，和兩位江蘇保安隊失伍的弟兄，兵監部的那位弟兄便邀他們上船去幫忙，他們自然求之不得，樂於從事。但是這時我們的肚皮打鼓了，有點不願意，急不暇擇，我們就直率地告訴鄰近一個住宅內的六十來歲的老者道：「我們一天沒吃飯了，若果有什麼可以給我們吃的，請你老先生方便一下吧，我們當照付飯錢。」那位老先生滿仁義，教他的家人趕緊弄飯給我們吃，不多一時，居然捧出來好幾碗菜，熱騰騰的飯，我們好似餓鷹是的，狼吞虎嚥地每人都幹了好幾碗。吃了飯，又捧上茶來，吃了茶，待要付錢，那位老者執意不肯，我們不

手」，把他的姓名記下，留待後會有期。他姓郭，名□□。

我們揩揩油嘴，奔上了船，大家弟兄也都一齊上船，解纜開行，我們便和那支離破碎，一片瓦礫的青浦告別了。連夜前進，岸邊的公路旁不斷地電光四射，汽車的喇叭，退却隊伍的脚步聲和着我們的櫓聲，慢慢地向前進，趕到崑山，天已大亮了。敵人的飛機，一批一批地翱翔在城市和城郊上空，『轟』『轟』地扔炸彈，火光，烟霧，四處冲天而上，我們不能再冒險駛行了，只得找了一個河汊兒住下。大家上去，訪問當地的一位聯保主任，遂在他的公館裏，買米菜煮飯，吃飯後，才開船，天已傍晚。走了一夜，我們真是疲倦極了，把什麼危險都置之度外，伸脚長眠，雖然我們的衣服行囊都遺失了，沒有任何東西來幫助我們抵禦那深夜水上的清寒！我們也是酣睡得甜蜜異常。

正在入夢的時候，只聽船頭上入喊：『快！快！照明彈來了！』我們本能地奔上岸去。剛跑不到五十步遠，『燭』地一聲，一個炸彈落在距我們的小船不過幾十碼的水中，船都幾乎被牠震翻了。我們上了岸，敵人的飛機又跟了來，大家伏在田裏，好容易等牠過去，才挨到一個小村落裏，買米買菜，又好好地吃了一頓飽飯。到了下午，這才慢慢地蹣進城。天已快黑了，正在馬路上找住處的當口，猛抬頭一看電線杆子上粘了一張招貼，上寫道：『高語罕先生鑒：潘明寓花園飯店□□號！』我們看見了這個招貼，真是喜出望外！連忙跑到花園飯店，果然公昭在那正急得要命，四出亂碰頭；兩個汽車夫也在那兒。

大家歡喜了一會，又聚談各人的遭遇，才知道公昭他們順着京滬公路到崑山，故與我們走岔了道。他到蘇州後，便寫了一封快信到南京給

鮑佛固先生，說我失了踪，惹得南京一班朋友跑到我家裏去打探消息，但是又不好對我的夫人說失蹤的話，只好含糊其辭地問我的消息，見她不曉得，他們也就不便多說。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我們既然會合，便馬上雇船到鎮江，中間還經過兩件可紀念的事：一是在無錫，一是在奔牛鎮。

我們船到無錫，是在十二號早晨，因為在船上既沒有被絮，又沒有衣服，夜裏的冷氣逼得我們大家都擠在一個艙的稻草鋪上面。幾日以來，弄得不成樣子，打算到了無錫，進城去，洗洗澡，換換衣服，那曉得一進西門城，道路還沒有問清，五架敵機便到了我們的頭上。我們不得已，跑到一家民房裏去暫避，那時得漢奸的信號槍釘在我們的房子後面放，敵機也就只在我們的上空盤旋。只聽『嗚』的一聲，飛機低飛了，

『礮』『礮』『礮』一連幾個炸彈下來了。我們所逃避的民房一共三進，後兩進都倒了，我們這一進的門窗戶壁也跳起舞來，大家都說『完了！完了！』老朱趕忙抓了一條滾絮蓋在身上，我忙蹲在方桌底下，老徐跑到大門底下，我們也就跟着他一齊伏在大門底下，聽天由命。一時敵機走了，大家以為沒事了，那曉得沒有二分鐘，牠們又來了，漢好的信號槍又在我們旁邊亂放起來。牠們一連又放了八個炸彈，結果我們這進房子也倒了一半，我們的大門這一邊還幸而免。等牠們走了，大家起來拍去滿頭滿臉滿身的灰塵泥土，面面相覷，幾乎不相信我們還在人間。房主人和他的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姐，也夥着我們在一塊伏着，倒很從容，對於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毫無有一點拒絕的意思，我們謝謝她們，開了大門走出去了。剛走幾步，飛機又來了，我們決定不再回到那家

去，各人散開了。還好，這一次來，漢奸的信號槍沒有響，炸彈也不丟了，飛了半天，又飛走了，我們這才大搖大擺地又從各方面聚集攏來。旁邊的鄉人告訴我們道：『離此不遠的城牆根下炸死了一個人！』我想大概就是放信號槍的漢奸罷！敵機第二次來襲不聽見信號槍，所以炸彈也不丟了！大家不約而同地開步急走出城，趕到河邊僱了一隻船，又開始了我們的歸程。船到橋邊，又遇敵機來炸橋，好久才過去。這是第一件可紀念的事。

第二件是在奔牛鎮。我們因為在無錫進城遇了轟炸，這次決定把船停泊在市鎮以外（距鎮數里之遙的一個河灣裏頭）。大家上了岸，信步踱到村莊上一間小學校裏面去，裏面的布置頗井井有條。他要我們題字，便由我代表，在他的題名簿上寫了我們簡單的幾句希望和勉勵的

話，周旋一下，便辭別出來。正在打算回船的時候，忽然擁上來十幾個實彈預備放的手持木壳槍的『武裝同志』，把我們團團地圍住，押着我們上了船。我們要他們不必一齊都上來，我們並不是夕人，絕不致和他們動武。公昭有點不耐煩了。我們坐在艙裏，把我們的公文，電報，和護照一件一件地給他們看，他們還不相信。公昭大叫道：『你們把我們當奸細嗎？豈有此理！我們在前線上槍林彈雨和敵人的轟炸下走過來，難道到了此地，反給我們一個回敬嗎！你們把武器誤用了！』我們一方面嘉獎他們的認真保衛地方的勤勞，一方面把各人的來歷和這次到前線去的任務細說給他們聽，他們漸漸地放心了。一個姓李的隊長（壯丁隊）手一揮，要那些蹬在船頭上如臨大敵的壯士們下船去。又麻煩了半天，他們執意要我們把船開到鎮上去，我們沒法，也只得依他了。開

到鎮上以後，安安穩穩地睡了一夜。我暗暗地想到，假使江蘇全省的壯丁隊都像奔牛的那樣，那在東戰場上所發生的作用，怕一定不壞罷！

到了鎮江以後，我們沒有錢了，一方面設法向民政廳口先生借了五十塊錢，一方面把傷兵和兩個保安隊分別遣之歸隊，預備帶着兩個汽車夫到南京，但是趕到我們搭車時，兩個車夫忽然不見了，仍然是我們四個——老朱，老徐，小潘和我——回到南京！

（全書完）

高語罕先生的著作

書 名	筆 名	實 價
白話書信(著).....	高語罕	八 角
國文作法(著).....	高語罕	八 角
作文與人生(著).....	王靈皋	六 角
國文評選(一二三集)(編).....	王靈皋	每集七角
理論與實踐(著).....	高語罕	一 元
讀者顧問集(一二集)(著).....	王靈均	每集六角
中國思想界的奧伏赫變(著)....	王靈皋	四角五分
康德的辨證法(譯).....	程始仁	三 角
斐希特的辨證法(譯).....	程始仁	二角五分
辨證法經典(譯).....	程始仁	四 角
百花亭畔(著).....	高語罕	四 角
現代情書(一二三集)(著).....	張其柯	各三角半
青年女子書信(著).....	張其柯	四 角
犧牲者(著).....	戈魯陽	四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烽火歸來

高語罕著

實價三角五分

出版者

亞東圖書公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內四〇五號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

總經理

亞東圖書館

上海陞平路四七五弄六號

分售處

各大書店

80